

泰国新移民的群体特征

——曼谷地区新移民个案研究

陈建荣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泰国; 新移民; 个案

[摘要] 在田野调查、访谈的基础上, 文章以泰国曼谷地区的中国新移民为实例, 对泰国新移民的群体特征进行了总结。文章认为, 从本质上讲, 新移民的移民动机、途径和创业的困难程度与过去并无不同, 只不过是世界移民潮的延续。

[中图分类号] D733.6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8)04-0071-06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igrants in Bangkok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New Migrants in Thailand

Chen Jianrong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Key words: Thailand; New Migrants; Case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interview and case studies of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Bangkok of Thailand, this article general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group and points out that new migrants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e old migrants in the motive and way of migration. They even meet the same difficulties in job-hunting. The Chinese new migration is the continuation of world migration.

近年来, 关于中国新移民课题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涌现了大批学术成果, 成为近期华侨华人研究的热点。从新移民的来源地看, 目前大多数新移民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福建人和温州人身上^[1]; 从新移民的接收国看, 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2], 对东南亚地区则关注较少。为此, 笔者利用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访问的机会, 对曼谷地区的新移民进行了初步的访谈和调查, 希望能勾勒出泰国新移民的基本特征, 以有助于对这一地区新移民情况的了解和深入研究。

一 研究对象的界定

“新移民”这一称谓, 最早是由中国的相关政府部门自己提出来的, 其所指和所称均是中国近年来移居国外的公民^[3]。作为政府文件上的一个名

词, 其内涵是比较模糊的, 而学术界对于“新移民”的内涵与外延有着不同的看法。许多学者把新移民内涵概括为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大陆、港、澳、台等地移居国外并取得永久居住权的华侨以及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 也有人把近一二十年来华侨、华人的再移民归入新移民的范畴; 还有的学者对“新”的内涵有不同的解释等等^[4]。但大多数人认为, 用“新移民”这一概念指称“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较为科学^[5]。不管不同学者对新移民内涵的解释有多大的不同, “新移民”这一称谓不仅并未取代“华侨华人”, 而且更像是华侨华人这一庞大群体中的一个子群体^[6], 所以新移民研究本质上是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子范畴。

关于泰国新移民, 曹云华教授在他的一项研究

①[收稿日期] 2008-05-09

[作者简介] 陈建荣,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讲师, 2005级博士生。

*本研究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案例采访由《泰国风》杂志社提供支持和协助。

中认为,泰国的新移民主要由四个次社群组成。第一个次社群是中国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通过各种方式移居到泰国的新移民;第二个次社群是目前居住在泰北山区的当年国民党军残余和随军撤退的一些云南籍平民及其后裔;第三个次社群是来自台湾的华人新移民;第四个次社群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从印支三国移民到泰国的华人难民^[7]。

关于新移民的规模,由于统计方面存在困难,一直未有相对比较准确的数据。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泰国。关于泰国新移民的人数,按泰国《新中原报》社长兼总编辑林宏先生最近的估计是 30 多万,但他的估计也是基于经验,而不是严格的数学统计。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泰国的新移民已经引起泰国社会的关注,关于新移民的新闻已见诸泰国的报纸和媒体。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说明泰国的新移民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值得进行研究。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局限在曹云华教授所指的第一次社群,即中国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通过各种方式移居到泰国的新移民。所有被访的当事人都是在 1978 年后从中国移居泰国的,但他们移居的方式各不相同,其中还包括一个不以移居为目的的案例(案例 6 陈先生)——之所以把他包括在内,是因为他实际居留泰国的时间要比在国内长,而且像他这样的人数量很大。

二 关于新移民的几个假设

综观近期国内有关新移民的研究成果,存在以下几个基本假设。

1. 来源多元化

相对于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新移民的来源地要广泛得多。过去由于地理和交通条件的限制,移民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新移民则来自全国各地,除原来的东南沿海继续保持其移民趋势外,内陆和东北也出现了较大数量的移民。

2. 受教育程度高

新移民总体上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老华侨。留学移民和技术移民的出现,提高了新移民的总体受教育水平。近年来,我国赴美、加、澳、日及西欧一些国家的留学人数不断增加,有很多留学生毕业后直接留在所在国就业^[8]。

3. 职业多元化

新移民的职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突破了老华侨以“三把刀”为主的行业取向,朝着职业多元化方面发展,涉及驻在国的科技、教育、商业和

金融服务业,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已崭露头角^[9]。

4. 有利于中华文化在当地的传承

新移民成为华侨华人社会中一支崛起的新生力量,为海外华人社会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有利于中华文化在当地的传承。

以上假设对于泰国新移民是否成立?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对泰国新移民代表进行了访谈,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以上假设进行验证。

三 泰国新移民的个案访谈

案例 1: 孔女士,来自海南,泰国康达建筑装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我是 1982 年来泰国的,当时 23 岁,来泰国之前在海南歌舞团工作。那个时候全中国人都想出国,每个人都怀有出国的梦想。我们团走的人特别多,我自己本身的条件也很好,因为国外有亲戚,特别是泰国。但是当时并不想来泰国,而是想去香港。我姨妈在泰国,本来打算先来泰国再去香港,但来泰国探亲后就走不了了,因为从泰国到香港是不能办的,所以就只能留在泰国。刚来时非常辛苦,不会讲泰语,不懂泰文,像聋子、哑巴,处境很艰难。因为我是学舞蹈的,一开始就在泰国华侨社会表演,跳中国舞蹈;只要有社团邀请,我就去参加。后来觉得这样下去不是长远之计,就去泰国的中国旅行社找了一份工作,干了几年。再后来,认识了我丈夫,因为他是从中国来泰国的建筑工程师,在他的支持下,我自学室内装潢课程,完成学业后就开了现在这间公司,而且已经初具规模了。经过多年的奋斗,我现在非常喜欢泰国。但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我们所有人都有一颗中国心。虽然来了 20 多年,我还是一个很真正的中国人,一点都没有改变。中国文化也随着我们这些人自然而然过来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对祖国的一点贡献,也是给泰国社会做贡献。

案例 2: 林先生,来自广东汕头,金利(泰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来泰国已经 17 年了,移民的动机是我的祖辈在泰国已经有多年的基础。另外,在移民之前,我是汕头一家国营公司的总经理,手下有 4 家分公司。虽然属于改革开放先行的一批人,但我当时还是对人生感到不满足,想到海外来闯一闯。刚从中国出来的时候,我跟大多数人一样,也碰到很大的问题。在汕头时,我的生活很优裕,但来到海外,整整有一年的时间做不到一笔生意。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认识到,原来在中国接触、学习的东西

在海外行不通，要从头开始学，要愿意真正融入这个国家。用我们的一句话说，就是要爱这个国家，爱这块国土。来到泰国这样一个新的环境，首要的事情就是生存；要找到机会生存，就要在你做的事情、你做的作品中，找到你的位置，然后融入泰国社会。泰国是一个很好的社会、一个民主的国家。泰国的国教是佛教，因为以佛教立国，泰国是一个宽容的社会，能接纳各个方面的人，所以新移民到泰国以后主要还是想如何融进泰国的主流社会。当初一起来泰国的有很多人，现在回头去看，这些人中，有些人发了财，有些人现在都不见了，有些人可能生活还很艰难。我从中总结了一点，就是跟本地人结婚的那些人，有90%都生活得比较好；反过来，假如夫妻两人都是从中国过来的，要生活得好一点，要发财，相对就难一些。我觉得，在海外闯一番事业，要触及当地的法律、文化、社会等问题。跟本地人结婚，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有一定的好处。

案例3：韩女士，来自湖北，泰中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

我是1990年来泰国的。来泰国之前，我是当老师的，但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我出来是为了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追求。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一代人都很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因为我们原来很封闭，改革开放使我们走出来成为可能。来泰国后，我做过很多工作，最早在《中华日报》做侨团记者，后来到中华总商会做公关和联络工作，然后自己开展览公司，做农产品进出口，再后来来到泰中经济协会工作，也帮助泰国操哇立上将的新希望党做些工作。这份工作是深入到泰国人的社会里面，做一些与政治有关的工作；我们是协助，是作为一个衔接，因为我们从中国过来，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可以帮他们促进中泰经济文化的交流。最后，我开始办学校，就是现在的泰中语言文化学院。本来我是因为不喜欢当老师才来泰国的，现在又做回老师，因为我觉得，现在发展华文教育对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中国的强大、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案例4：马女士，来自北京，泰国阳光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我来泰国11年了，在北京时做过记者。当时中国人都揣着一个梦想，想出去走得更远一点，看得更多一点。我们知道老一辈的华侨很辛苦，我们这一代也是如此！我刚来泰国的时候，两手空空，可以说身无分文；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语言不

通，也没有人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生存下去？无论有什么样的机会，我们都要把握住。你不能考虑你自己过去在中国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什么地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曼谷的公园听说按摩能赚钱，就开始自学中医按摩。苍天不负有心人，我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别人会讲你是做什么保健什么按摩的，我不在乎，我觉得这些对当时的我来说都不重要，我只想凭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梦想。这样，我在蒙天酒店工作了大概六七年，这段时间开始铺展了我的新移民道路。我今天能够有一份自己比较喜爱的稳定的事业，是经历过心灵上的磨练的。当然，我们移民到其他国家，也会失去很多原来的东西，包括高级职称、文化上的肯定等。但不管怎样，来泰国11年，从情感上我非常依赖、非常留恋这个国家，非常爱这里，爱这里的文化，爱这里的人民。

案例5：郑女士，来自广东梅州，泰国蓝甘杏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

我来泰国16年了。我原来在广东梅县文化局工作，当时准备调动，但文化局不肯放，不肯给商调表，半年时间都调不成，所以心里就想出去。那时我对海外其实没有什么概念，甚至觉得资本主义国家跟自己是格格不入的，但为了寻找一个新的人生起点和一个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地方，所以就想到一个可以不用商调表的地方。来泰国以后，这里的民情风俗给我一种比较包容、比较温和的印象，这种民风我很喜欢。另一个是气候，第三就是这里的水果多，我特别喜欢水果，这三点就把我留在泰国了。但说实话，留在泰国并没有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会有一个能够让我全心全意搞创作的环境，根本就没有，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是很失望的。但是，从其他方面看，这个社会给予我的回报还是能够平衡我所失去的。我有一点优势，就是我会讲潮州话。在这里，尤其是曼谷地区，讲潮州话的老华侨很多，这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过渡。我现在所在的蓝甘杏大学是国立的，在国立大学里面，它是第一所把中国书画列为一门课程来开的大学。从2004年开始，我就被聘为客座教授，正式开这门课。这十几年来，实际上我在义务为泰国的很多所大学，例如法政大学、诗那卡琳大学、军官预科学校、科技学院等，做一种中国画技法的示范。同时，我也在帮泰国卫生部翻译一些泰国跟中国交流的资料和录音，介绍这里的情况，现在还在泰国卫生部开了第5期的中文培训班。我原来在中国接受的文化艺术教育，在这里发挥了一点作用。

案例 6: 陈先生, 来自广东潮汕, 水货商。

我来泰国已经 13 年。这十几年来我做了很多生意, 什么东西有利润就做什么, 主要看大陆和泰国两地的价钱。一开始做 CD 片, 因为大陆的 CD 片比曼谷便宜; 然后是石英表, 因为老家潮汕地区的石英表成本相当低; 现在做 MP4, 因为在深圳可以拿到相当便宜的 MP4。现在我从深圳进货, 带到曼谷出货, 然后又从曼谷带些海马回去, 赚取两地的价差。做我们这一行, 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改变货源。我做的是水货, 而且是一个人做, 没有公司, 赚的是体力钱; 还有风险, 因为如果海关认真起来就可能把货没收, 那样就不但赚不到钱, 还要赔上飞机票。刚开始很紧张, 现在好了, 如果遇到刁难, 打点一下一般都会顺利过关。但我也不能一次带货太多, 每次从大陆带来的 MP4 也就两三百个, 从泰国带回去的海马只有一二十公斤。做我这样的生意, 需要在大陆和泰国之间不停奔走, 细算起来, 在泰国呆的时间要比在国内长, 因为回国拿货和出货比较快。以前住旅馆, 觉得不太方便, 有时警察还会来找麻烦。现在住公寓, 算起来比住旅馆还便宜, 而且还能当仓库。我刚开始是来探亲的, 我们那个村在泰国的亲戚算起来已超过 3000 人了, 后来就想到做生意。刚开始时亲戚帮助很大, 有帮忙买机票的、办签证的, 还有直接经济资助的。以前做石英表的时候, 一下子来那么多货, 要寄放在亲戚那里, 在旅馆的话马上会有人去报警, 就有警察来查货。当然, 跟老华侨的关系也有不好的, 也有人嫉妒我赚钱。我也帮过别人, 今年村里来了 5 个人, 要去山里帮老乡做大米生意, 就是我帮忙过来的, 还在我这里住了一晚。

四 泰国新移民的群体特征

1. 来源地

传统上, 泰国华侨华人主要来自三个地区, 人数最多的是广东潮汕地区, 其中又以潮汕人居多, 其次是客家人和海南人。而从新移民的来源看, 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以上案例也表明, 除了原来这几个地区外, 内地移民到泰国的人数逐渐增多。

在肯定本文第一个假设的同时, 也要注意, 虽然泰国新移民的来源出现多源化的趋势, 但在短期内并不可能改变泰国的移民格局。因为原来移民的三大地区——潮汕、梅州和海南的新移民也在不断进入泰国, 特别是海南新移民的增长势头尤为迅猛, 泰国华人社团已有人认为, 海南移民的数量有可能超过客家人而成为第二大华人群体。

潮汕、梅州和海南这三大地区新移民数量的增加也表明, 社会资本和移民网络仍在泰国新移民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各种资源的集合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 皆可通过占有某种持久不衰的关系网络而获得社会资本, 并且这一关系网络是彼此所熟悉的、得到承认并或多或少已制度化的网络。至于移民网络, 则指的是海外移民社会与故乡、返国的移民及其亲友、同胞之间的各种纽带关系。由于移民网络可以为准备移民海外的亲友或同胞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支援, 包括提供海外工作市场的准确信息、协助提供移民担保和贷款、提供合法或非法的旅行证件、安排出境、代找律师以及为初抵他乡异土的新移民提供住宿等, 因此, 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国际移民的成本和风险, 从而使得跨境迁移活动获得惯性和永久的动力, 能够自行不断地进行并扩大规模。移民网络是移民活动发生并能够长盛不衰的最重要原因和内在机制^[10]。从以上案例看, 尽管他们的移民动机各不相同, 但许多人之所以成为跨国移民, 是因为跟他们有着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的人已移民在先, 如案例 1 的孔女士、案例 2 的林先生和案例 6 的陈先生。业已存在的移民网络对他们的移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而移民实现以后, 移民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也有助于他们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另外, 移民网络还具有乘法效应, 一个人到了海外, 便能够逐步地将家乡的亲友一连串地带到国外定居, 这就是所谓的“链锁移民”。如案例 6 的陈先生, 他自己到泰国后, 又先后帮助过 5 个老乡去泰国。基于以上认识, 可以预见新移民的到来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泰国华侨华人的格局。但尽管如此, 泰国新移民来源多源化的意义并不会因此而削弱, 他们的到来丰富了泰国人对中国的认识, 改变了很多泰国人“中国即唐山, 唐山即潮汕”的简单想法。

2. 受教育程度

假如从本文所涉及的 6 个案例来看, 第二个假设是成立的。除案例 6 的陈先生是小学文化外, 其他 5 人均均为高中以上文化, 有几个还有大学文凭。来泰国的早期移民多是迫于生活压力而下南洋, 刚到泰国时都是从做苦力开始。跟他们相比, 新移民接受教育的程度确实比较高, 大部分人在国内接受过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但研究者须对这种通过纵向比较得到的结果持谨慎的态度。

第一, 新移民受教育程度高是基于他们与老移民的纵向比较, 考虑到中国国家教育水平历史发展

这个时间维度,我们不能轻率得出新移民精英论的结果。我们要把新移民放在整体的中国教育水准上来衡量,而不是把他们与不同时代的老移民进行比较。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整个新移民数量中,受教育程度高的也只是极小部分,而像案例6陈先生这样的新移民仍是主要部分。据笔者在曼谷唐人街附近台北旅社的调查,这里长期居住的像陈先生这样的潮阳人,达200人之多。

第二,新移民受教育程度高并不等于说他们可以避免老移民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移民早期的适应问题仍然需要他们付出时间和精力,甚至与老移民相比,由于新移民在移民前生活并不会太糟糕,移民目的又比较明确,他们会感觉失去更多,就如案例4马女士所感受到的那样。

第三,新移民受教育程度高并不当然代表他们对祖(籍)国的感情会比老移民深。一个国家的公民移民到外国的时候,他对祖(籍)国的感情不是由他的受教育程度决定的。在泰国,有很多老华侨,虽然不识字,但他们对自己家乡和国家的感情却很深,他们要求自己的后代在家一定要讲家乡的方言。相反,有些新移民则缺乏这样的观念。

3. 从事的职业

与其他地区的新移民一样,职业多元化也是泰国新移民的一个显著特征,单从本文选取的6个案例也能明显地看出这一点。现在在曼谷或泰国的其他主要城市,经常能碰到形形色色的中国新移民,他们有的是华文教师,有的是音乐工作者,还有有的是书法家,而不像以前,只能看到商人。

新移民职业多元化的出现首先与他们自身的教育背景有关。与老移民相比,新移民他们在出国前已经具备一定的工作经历和职业背景,移民到泰国后自然会寻找接近自己原来工作的机会。新移民职业多元化还与移居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关。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在泰国的劳动力分工与老移民时代已大不相同,加上全球化进程对泰国国际分工的影响,以及中国事务在泰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上升,造就了泰国对各种涉中人才的迫切需求,从而给新移民创造了很多难得的就业机会。从文章的6个案例看,有很多人都是从事与中国有关的事务,如案例3韩女士从事的华文教育,案例5郑女士从事的国画教育和案例6陈先生从事的水货买卖。

尽管新移民出现了职业多元化的趋势,但从类型学的分析来看,还不能完全脱离职业经济取向集

中这一局限,绝大部分新移民仍从事经济型工作。目前在泰国,尽管有较多的人从事文化工作,但这也只是经济型工作的衍生,因为它能带来经济效益。这一点反而跟老移民从事文化工作不同,老移民是在经济地位确立以后再业余从事文化工作的,而文化工作对新移民来讲却是谋生的手段。

新移民职业的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移民试图改变生存环境的两难境地。就移民体来讲,生存与发展是他们的根本需求和目的。为了生存或得到更好的发展,他们选择了具有风险和挑战性的移居他国这条途径。但他们很快发现,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抛开原来的理想去适应移居国的生存环境,就如案例4马女士和案例2林先生所说的那样,“你不能考虑你自己过去在中国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什么地位”,“来到泰国这样一个新的环境,首要的事情就是生存”。新移民职业经济取向集中这一特点也表明经济行业仍然是新移民容易取得成功的行业,这一点跟老移民没有什么区别。但这对于新移民来讲,并不是好事,因为很多人为此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且,他们在经济行业的优势并不如老移民明显,也许不能取得老移民那样的经济成就。就泰国来说,老移民的资本积累已经相当雄厚,而新移民要进行类似的资本积累,不知道还要经过多少年;而且,泰国经济形势的发展也使资本积累的困难程度大大增加。

4. 新移民与中国文化

对泰国新移民的考察并不能证明本文的第四个假设,新移民对中国文化在移居国的传承作用不能过分夸大。

第一,对于移民来讲,文化的保留与融合是一对正反的变量。对泰国新移民这方面的考察结果很有意思,他们表现出比老移民更愿意融入当地社会的心态。除案例6的陈先生外,其他5人基本上都用不到10年的时间融入泰国社会,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泰语,工作中使用泰文,而且他们的小孩已经不会说中文了,而这个过程对老移民来讲则要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提醒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十几年前侨史学界一场关于同化论的争论。当时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二战后老华侨华人逐渐老化,加上东南亚一些国家执行同化政策,支撑华侨社会的三大支柱——华侨社团、华文报刊和华文学校萧条沉寂,第二、三代华人对中华文化、语言变得陌生,因此华侨、华人将很快被同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华人作为少数民族是不会被同化的,其原

因除了文化方面的因素外,学者们或许还没有预料到新移民的注入对华侨华人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11]。现在从泰国的情况来看,更多地印证了争论的第一种观点。

第二,新移民的到来并未扭转泰国华文报刊的困境。作为华侨社会三大支柱之一的华文报刊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但泰国 6 家中文报刊处境却很艰难。原因有二:一是缺少中文人才,因为年轻人一般都不太懂中文,甚至连泰国一些著名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中文程度也不高;二是受众有限,本地人一般都看不懂华文报纸,也不太愿意看华文报纸,所以华文报纸的销量很小,经营难以为继,有些报纸靠的是企业赞助,这种经营模式使独立办报的理念很难实现。从理论上讲,新移民的到来使华文报纸潜在的受众增加。但对曼谷 6 家华文报纸销量的调查表明,这几年的销量一直维持在原来的水平,即 1 万份左右。新移民的到来并未使华文报纸受益,原因在于新移民获取信息的途径比较广

泛,反而觉得华文报纸对他们并不重要。在笔者所采访的 6 个案例中,除案例 6 的陈先生不看报纸外,其他人看的是泰文报纸,同时他们获取信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途径,那就是便捷的互联网。

五 结语

本文对泰国新移民群体的分析基于有限的案例,且受采访对象的限制,未能实现统计学的随机抽样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分析结果的客观程度。但笔者通过对泰华社会的近距离观察来修正案例的分析,以期更加接近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泰国新移民属于世界移民浪潮的一部分,学者们关于新移民的假设对泰国新移民基本适用,但泰国新移民也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在移民的来源地、受教育程度、从事职业和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作用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注 释】

[1] 相关研究参见施雪琴《改革开放以来福清侨乡的新移民——兼谈非法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 4 期)、朱美荣《福建省新移民问题剖析及相关政策初探》(《人口研究》2001年第 5 期)、王付兵《福建新移民问题初探》(《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 4 期)、沈燕清《福建新移民在美国——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福州地区非法移民个案研究》(《世界民族》2004年第 1 期)、吴潮《浙江籍海外新移民研究初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 3 期)、王春光《移民的行动抉择与网络依赖——对温州侨乡现象的社会学透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 3 期)和郭剑波《温州新移民出国特点简析》(《八桂侨刊》2006年第 1 期)。

[2] 相关研究参见李明欢《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 4 期)、章志诚《关于欧洲新移民问题的探讨》(《八桂侨刊》2002年第 1 期)、傅义强《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研究述评》(《八桂侨刊》2006年第 1 期)、李明欢《一个旅欧新侨乡的形成、影响、问题与对策——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新侨乡调研报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 4 期)、庄国土《从跳船者到东百老汇大街的“主人”：近 20 年来福州人移民美国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 3 期)、曾少聪《美国华人新移民与华人社会》(《世界民族》2005年第 6 期)、庄国土《近 20 年福建长乐人移民美国的动机和条

件——以长乐实地调查为主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 1 期)和王维《移民网络、社会资源配置与中国东北新移民——美国旧金山湾区田野调查札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 2 期)。

[3] 王康武著、程希译《新移民：何以新？为何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 4 期。

[4] 赵红英：《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 4 期。

[5] 张秀明：《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 3 期。

[6] 同 [3]

[7] 曹云华：《泰国新华人管窥》，(泰国)《泰中学刊》2002 年。

[8] 同 [4]。

[9] 赵红英：《大陆新移民的形成原因及其特征》，《海内与海外》2002年第 3 期。

[10] 关于社会资本和移民网络的论述，参见王维：《移民网络、社会资源配置与中国东北新移民——美国旧金山湾区田野调查札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 2 期。

[11] 关于这场争论的内容，详见赵红英《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吴宏娟】